

WEN HENG

2009 卷

文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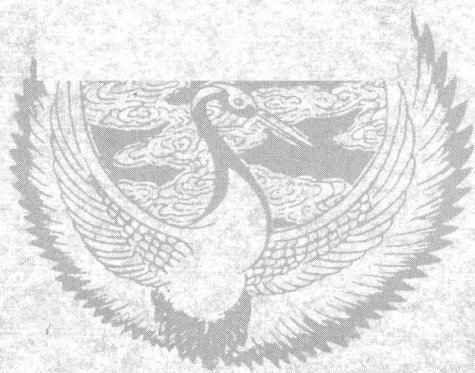


上海大学出版社

WEN HENG

2009 卷

文衡



上海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衡. 2009 卷/张寅彭主编. —上海: 上海大学出版社, 2010. 7

ISBN 978 - 7 - 81118 - 638 - 3

I. ①文… II. ①张… III. ①文学研究—中国—文集
IV. ①I206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14703 号

责任编辑 焦贵平
吴雪梅
封面设计 柯国富
技术编辑 孟 玫

文 衡

(2009 卷)

张寅彭 主编

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上大路 99 号 邮政编码 200444)

(<http://www.shangdapress.com> 发行热线 66135110)

出版人: 姚铁军

*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排版

上海华业装璜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960 1/16 印张 23.5 字数 445 000

2010 年 7 月第 1 版 201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81118 - 638 - 3/I · 111 定价: 58.00 元

主 编 张寅彭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 晓 明 张 寅 彭 陈 晓 兰 董 乃 斌

曾 军 蔡 翔 薛 才 德

执行编辑 刘 奕 李海霞

目 录

清民文史研究

李慈铭诗观平议	张寅彭	1
杭世骏主讲扬州安定书院时间考	蔡锦芳	21
论乾嘉汉学家的性情诗说	刘 奕	33
十七世纪江南文化世族的科举与文学	姚 蓉	57
晚清所译域外史籍述论	王培军	74
一场情感直觉的史学革命	朱渊清	93
独立的“她者” ——才女王微的交游与追求	宋清秀	116
王昙年谱简编	郑 幸	129

读 书 会

文化研究,还是文学研究	蔡 翔	155
-------------------	-----	-----

科研项目成果示例

论苏轼《赤壁赋》的诗性叙事	董乃斌	166
历史叙事中的叙述者与作者 ——韩愈的修史观及其传叙文的叙事特征	李 翰	175

《诗·桧风》系年辑证

——春秋诗歌系年辑证之十三	邵炳军	184
奇字论考	吕 浩	195
山西省阳泉市冥婚形态调查分析	黄景春 贾玉洁	208

文学与文化

鲁迅为何弃写“杨妃”?	吴仁援	220
文载道其人其文	任丽青	232
从文学视窗看爵士乐时代的美国与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滩	张 薇	252
波德莱尔、本雅明与城市“浪荡文化”	邓金明	262
战时中国文学的乡土语文地图		
——1940 年代乡土叙事的文体发生学考察	杨位俭	273
论张大春小说的文化遗产因素	王丽娜	295

文 献

易学史略	沈隼民	303
陈尊默《文心雕龙校注》石印残本校理	饶龙隼	322
帝谱考	萧 艾	339

讲 合

民主时代的女人教育

——欧洲古典文学教学散议之一	肖有志	343
未完成的改革理念		
——以上海“二期课改”为例的讨论	罗小茗	348
对大学语文课程性质及相关问题的思考	黄建华	359
编后记		367

李慈铭诗观平议

张寅彭

李慈铭(1830—1894)^①初名模,字式侯、法长。后更名慈铭,字爱伯,号莼客,室号越缦堂,世称越缦先生。浙江会稽(今绍兴)人。他屡试不第,光绪六年(1880)始中进士,时已年过五十,以致翰林院文士,竟多为其后辈。官止于山西道监察御史。观其一生,实有用世之心,无奈仕途不达,而生怨怼之愤情,又终以有学而保持了操守。李氏身当道咸同光之世,一方面对于朝政之积弊几近绝望,既不屑为而又欲为之,而终于无所作为;一方面又以能继乾嘉学术高峰之后而深幸生逢其时。^②他似从很早起对此即已有所意识,故全身心于经营自己的日记,详载政情民俗、读书心得,乃至人际交往、饮食起居,“积数百万言,亘三十余载。其用力也罔有或辍,其为事也无乎不赅。近之可方湘乡日课之勤,远之可继亭林日知之博”。^③故《越缦堂日记》的内容以政事和读书札记为两大端。其“每读一书,撮其指意,钩元挈领,采撷其英华;起废箴盲,纠绳其谬误,略如四库全书《提要》之例,而详贍过之”,足当后学之津梁;而“断烂朝报,有关一代之典章;乡里逸闻,考见百年之兴废”,^④又可备史材于他日。对于自己的人生,此举诚可谓有识、有为矣。

李越缦一生学术荟萃于《日记》。其学贯通四部,大抵以能守传统学术之正宗为其基本性质。^⑤四部之中,略以史部为较长,而其心得之有系统者,则断然当在

① 李慈铭生于道光己丑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不数日即入庚寅年,为两岁。而按公历,皆属 1830 年。本文凡涉越缦岁数处,及标示的公历,均按此计算。

② 李氏尝云:“考证之学,国朝为最,国朝尤以乾嘉之间为盛。能读其书者,庶于经史无误文别字谬辞枝说。士生其后,可谓千载一时之幸。”(咸丰十一年六月十九日日记)

③ 王存《征刊越缦堂日记启》。

④ 同上。

⑤ 如于经学,虽不拒宋,所重则在汉。其评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云:“马氏从孙毓说,以《传》公孙指成王为非,而谓周公亦幽公之孙,以硕肤为肤革充盈,异于狼之跋扈,亦病纤啬。郑君笺诗,成于晚年,最为纯粹。略举五则,以见《笺》之不易读,而郑学之可贵也。”(光绪八年十一月初二日日记)评胡承珙《毛诗后笺》云:“胡氏此书,体例与并时马元伯之《传笺通解》、近出之顾访溪《学诗详说》大旨相同。不载经文,依次说之,兼采诸家,古今并列,微不及马,而胜于顾。盖马专于汉,顾偏于宋,多识达诂,终为《诗》学专家。若其取义兴、观,多涉议论,后人之见,未必果得古人之心。此细绎经文,体玩自得,乃宋欧阳氏以后之法。唐以前家法皆重训诂,而不为《序》外之说,所以可贵也。”(光绪八年六月十五日日记)又评顾惟康《学诗详说》,则谓:“余不喜驳斥宋儒,而此等是非,自不可混,聊一发之。惟康谓朱子说视旧说益为允当,真村夫子之见矣。”(光绪七年五月二十八日日记)好恶立现。诗学则宗老杜,详本文。

集部之诗学。这不仅有他的自评和各家之评为证,^①也是多年来读其《日记》、《读书记》等留有的印象。越缦诗观在同、光之际别树一帜,历来受到重视。其《日记》中的说诗文字,量既不小,说亦充分。种种议论,形成了他的独特然又极守正统、多方却又一以贯通、缜密而终致厚重的诗学思想。

一、高扬明诗的诗史观

李慈铭最为人诤为独异的想法,是他的高视明诗的诗史观,以为远胜于宋。昔钱默存《谈艺录》论清诗诸家,曾揭出姚鼐、张际亮、谭献等人宗明诗的立场,诚能探微。^②但清人主流之见一般都无置明诗于宋诗之上的,钱牧斋、朱竹垞都不曾采取过这样的立场。直至与李氏同时的张之洞、王闿运,乃至更晚的陈衍等,都无此立场。^③故从其明诗观入,较易窥其诗学之实质。

李氏此说实亦其来有自,但其态度之正式,其说完备的程度,则非他家可比:

谢在杭谓明诗远胜于宋。又谓宋人尚实学,而明人多剽窃,故究竟不及宋,语固矛盾。然予谓明诗实过于宋。季迪惜不永年,倘逞其所至,岂仅及东坡哉?中叶之空同、大复,末季之大樽、松圆,皆宋人所未有。宋人自苏、黄、陆三家外,绝无能自立者。明人若青田、西涯、子业、君采、昌谷、子安、子循、沧溟、弇州、梦山、茂秦、子相、石仓、牧斋,皆卓然成家。即孟载之风华,亦高于昆体;中郎之隽趣,尚永于江湖。后代平情,无难取断。贵远贱近,徒以自欺。(同治三年十月十九日日记)

谢肇淛的议论见于其《小草斋诗话》卷三。有意思的是,清初王士禛也曾注意到谢

① 如《白华绉绉阁诗初集序》:“所学于史为稍通”,“所得意莫如诗”。王式通《越缦堂文集跋》:“先生说经,确守乾嘉诸老家法,于史学致力最深。”徐世昌《晚晴簃诗汇》:“生平博综群籍,尤精于史。”汪辟疆《近代诗小传稿》:“越缦喜谈经学,实非所长。一生学术,乃在乙部。诗文尤负重名。所作诗辞旨安详,声希味永。”越缦中年以后喜谈经史,屡言“雅不喜评抹诗文”,此乃循“余事作诗人”之老例也,非不重诗文。

② 《谈艺录》四一:“谭复堂好明人诗,故其论诗多皮相语。”同条补订三谓翁覃溪“深不然惜抱之取明七子”,又云:“惜抱诗集卷五《硕士约过舍久候不至余将渡江留书与之成六十韵》:在昔明中叶,才杰蹈高遐。比拟诚太过,未失诗人葩。蒙叟好异论,舌端骋饕餮。抑人为己名,所恶成创痍。众士遭丰蔀,皎月沦昏蟆。”为明七子翻案,言甚激烈。又四三:“程秉钊《国朝名人集题词》有曰:论诗转贵桐城派,比似文章孰重轻。自注:惜抱诗精深博大,足为正宗。”默存于此按下按语云:“张亨甫诗集《润臣以近诗见示率题》三首,亦以渔洋与惜抱并推为风雅正宗。亨甫质美未学,心粗气浮,祈向不过明七子。故姚石甫为作传,称其少年诗才可及空同,若去其粗豪,则大复矣云云。亨甫《题叶润臣诗》第二首曰:李何骖驾见高徐,风骨孤寒世未如。不信后人轻七子,反成老马戒前车。是其推崇惜抱,正以惜抱不废明七子,可追配‘清秀李于鳞’之渔洋耳。”

③ 明人学唐,自居宋上,则可不论。如李攀龙辑《古今诗删》,以明诗直接唐诗,若无宋元诗者。清人宗明诗较显者,如沈德潜编唐、明、本朝诗,亦不取宋元,谓“宋诗近腐,元诗近纤,明诗其复古也”。(《明诗别裁集》序)然李慈铭最不喜沈,以为不知诗,故李氏之明诗观与沈绝无关系。

氏的这同一段议论,但渔洋对谢氏的矛盾之论,所取却正与越缦不同:

《小草斋诗话》云明诗远过于宋。又云本朝仅数名家力追上古,然刻画摹拟,已不胜其费力矣。其他作者,虽复如林,上乘隽语,人不数篇,要其究竟,尚不及宋。宋人有实学,而本朝多剽窃故也。右二条自相矛盾,当以后论为允。(《香祖笔记》卷二)

渔洋之取舍显然较为稳健,代表了清人在宋、明诗比较上的一般之见。^① 上述越缦堂“语固矛盾”云云,即承渔洋此语而来,但却变贬为褒,改了方向。

当然,王渔洋对于明诗的评价,实际上也并不低,如云:“有明一代,作者众多。”^②“明兴至弘治百有余年,李、何崛起中州”,“明音之盛,遂与开元、大历同风”。^③ 明确地肯定七子,并以明诗直接唐诗。他在康熙间,既承钱牧斋《列朝诗集》之说,又对牧斋贬斥前后七子过甚的弊端,下大力予以批评纠正,而与同时的朱彝尊不同。竹垞撰《明诗综》,虽亦为纠牧斋而作,但对七子的看法基本上仍承袭钱说。渔洋则明确表示:“弘、嘉间,虞山先生之论不足为据。”^④故相较于牧斋的否定明诗主流诗派的明诗史之建设论,渔洋(也包括竹垞)的明诗观要远为正面和积极。不过清初直至乾隆时的百余年间,诗坛始终保持着几近众口一词的对于七子乃至明诗的讥斥之声,反映的实际上是牧斋的立场。渔洋诗学虽也声势不小,乾隆间甚至还以张宗柟编成《带经堂诗话》而再掀高潮;但在与明诗的关系方面,他本人却又再三被人贬作“何大复”、“李于鳞”,^⑤成为康、乾间代明人受过的集矢之的。

李慈铭的明诗观直承渔洋,所以对上述渔洋取舍谢肇淛之论的不同,他才会略过不表。他实是继张宗柟之后渔洋诗学的又一位知己。据他本人多次明白宣示,其诗学之取径,独许本朝之王士禛和朱彝尊两家。他尊竹垞为师承之肇始,自谓十

① 渔洋答刘大勤问,对此讲得较为具体:“明诗胜金元,才学识三者皆不逮宋。而宏、正四杰,在宋诗亦罕其匹,至嘉、隆七子则有古今之分矣。弇州如何比得东坡?东坡千古一人而已。”(《师友诗传续录》,载《清诗话》)

② 《七言诗抄凡例》。

③ 《蚕尾续文》。渔洋与七子诗学的承继关系,清人多已识之。如纪昀云:“渔洋以清空缥缈之音,变易天下之耳目,其实亦仍从七子旧派神明运化而出之。”(《冶亭诗介序》)

④ 《古夫于亭杂录》。转引自《带经堂诗话》卷四。

⑤ 边连宝《病余长语》卷六引戈涛语,比之为何大复:“近日新城之学遍天下,余以为一信阳而已。信阳画自唐以上,新城则兼泛滥宋元以下,故每作一诗,胸中先据有一成诗,而后下笔追之,必求其肖而止。所作具在,可一一按也。余非敢瑕疵前人,然恐诗道坐敝于此,则明七子不独任咎。”又吴乔《答万季野诗问》有“清秀李于鳞”之讥,即指王士禛。赵执信《谈龙录》:“阮翁素狭,修龄亦目之为清秀李于鳞,阮翁未之知也。”纪昀《冶亭诗介序》:“吴修龄目以清秀李于鳞,则衔之终身,以一语中其隐微也。”则似渔洋非不知其语,与秋谷微不同。日人青木正儿《清代诗歌评论史》推测是指钱谦益,误。

七岁即喜阅《明诗综》,“平生得诗法之正,实由于此”。^①对渔洋则服其精确:“王渔洋论诗悟绝古今,尤善分别。”^②李氏论人一向少所许可,故这些表白于其诗学的意义自是重大。

越缦对明诗之高启、李东阳、前后七子、公安、程嘉燧、陈子龙乃至竟陵钟、谭等几乎所有的诗人诗派,虽评鹭不等,但都持肯定的态度。其中尤其对李梦阳高致推崇,对李攀龙的评价也较牧斋、竹垞等大幅提升,而最与渔洋同调。从前牧斋贬斥二李,却又欲高抬明诗,遂不免陷于抵牾;流风所及,明诗的地位在牧斋身后之清人的一般评论中,自然也就因重贬七子而始终不会很高,甚至被弃如敝屣了。越缦兼重二李,不仅与牧斋、竹垞不同,也较渔洋对沧溟的态度更为彻底,^③这就使肯定明诗主流派别前后七子,与肯定明诗的结论,在逻辑上完全理顺了关系。

但时至同、光,李慈铭全面肯定明诗意识和努力,仍然如渔洋在康、乾间那样,并不能成为明诗研究的主流立场。如光绪、宣统间产生的又一种大型总集类著作《明诗纪事》(陈田辑),^④虽详列明诗各期作家,及前贤各家之见,并作有各期之小序及大量按语,但其辑旨除了“尤亟致意于明末”一条外,对明诗主要时期的看法,大抵仍在牧斋与竹垞的牢笼之下。^⑤陈田与李氏同时而稍后,或因两人时代相距过近,《明诗纪事》竟未采及李慈铭之语。^⑥这也可见越缦堂的明诗观,在当时似未能产生实际的影响。^⑦

二、宗明诗与宗杜一致

李越缦的明诗观对他本人的诗学是有极大之干系的。他对宋以后诗学两个核

① 参其光绪十年闰五月初八日日记。

② 参其同治三年十一月十三日日记。

③ 汪琬《说铃》记渔洋语:“若遇仲默、昌谷,必自把臂入林;若遇献吉,便当退三舍避之。汪云:都不道及汝乡于鳞耶?渔洋默然。”可见渔洋对沧溟态度之暧昧。

④ 《明诗纪事》自序称十签四千余家,今实存八签、三千余家。未刻两签,据章培恒推测,当为方外、闺秀。(199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本《明诗纪事》前言)其说是。

⑤ 如观其所编采前后七子、公安三袁、竟陵钟谭等家,及所下按语,便可知其于明诗主流作家并无所见。书中虽以违碍而不录《列朝诗集》之语,但其看法实多阴取自牧斋。如论李梦阳,专言其对李东阳之态度前恭后倨,与《列朝诗集》李东阳条之专拉空同比附,可谓前后呼应。此书之发明仅在详于明末而已,辛集序所谓“在昔渔洋与竹垞论选明诗,谓不宜略远详近。以今日而溯朱明,年将三百,亦云远矣。余搜采明末诸家,补《诗综》之阙漏,于斯集尤亟致意,然未敢言备也”。

⑥ 《明诗纪事》中采入的各家之论,最晚似是道、咸间人,如莫友芝《邵亭集》、潘德舆《养一斋诗话》等,均稍早于李慈铭。

⑦ 越缦尝自谓:“予憨拙,不能事贵游,又素偃蹇、懒酬应,平时未尝以文字语人,故问名者绝少,亦不以此意为。”潘曾绶题其集,亦叹喟:“才如之子少,海内孰知音。”(俱见咸丰九年十月初二日日记)虽系其早年境况,然颇可概其一生。

心问题的看法：(甲)宗老杜，(乙)作诗之才、学关系，即与其全面肯定明诗的立场联系为一体。^①

明七子所宗乃是老杜。这是继《毛诗》后，中国诗学在中唐以后逐渐确立起来的最正大之根据。前、后七子以其作为明诗最大派别、延续时间又长的超强影响力，为这个新的诗学根本原则做了一次宏大的实践和宣传。所以对于一代诗史乃至宋以后诗史中的这一股主潮流，如果不能识其成立的正当性，则不惟明诗史无以建立，明诗之前的宋诗与之后的清诗也将无以承接，整个中国诗史的下半段，或将如七宝楼台，散为碎片矣。这里实际上有一个以宗杜为核心的“诗统”的问题。渔洋、越縵的明诗观即在此等处显示了他们颇为卓异的眼识。如渔洋云：“宋明以来诗人学杜子美者多矣。予谓退之得杜神，子瞻得杜气，鲁直得杜意，献吉得杜体，郑继之得杜骨。”^②一以老杜贯串中唐至明人，可谓抓住了宋以来诗史的主流。人们一向都习惯将渔洋更多地与王、孟联系在一起，这就其全部诗学而言，自然也不能算是太大的误会，但终究还是有失偏差的。而明末清初人批七子，初虽有其合理性，然越批越烈，无所节制，往往伤及宋元明清诗之学杜这一条主线脉。^③

李慈铭重视和维护明七子，主要也在于七子学杜的实绩，他认为七子是明清诗人中学杜之最为成功者。他也曾自诩自己为“真杜”。他对此的用心是极为认真的。如同治十一年(1872)四月十九日的日记云：

作书致香涛，示以昨诗。得香涛复，言予诗雄、秀二字，皆造其极，真少陵适派。其火候在竹垞、阮亭之间。竹垞、阮亭七古，皆学杜也。此语殊误。阮亭七古平弱已极，无一完篇，岂足语少陵宗旨？竹垞亦仅规东坡耳。若予此诗，拟之空同、大复，则殆庶乎？再作书致香涛，申言作诗宗派及李杜韩白玉孟钱刘沈宋温李诸家之优劣。

“昨诗”者，乃越縵应友人董文涣请，为秦宜亭所画《太华冲雪第二图》所题的一首七古。^④诗成后，董评为“学韩”，不当越縵之意。^⑤而对张香涛“真少陵适派”之评，他自无间然，但也不尽满意，还要耐人寻味地进一步细绎出朱、王两家的学杜不如李、

① 钱锺书曾云：“当时浙人如李莼客等之学唐人，实皆以明诗作阶梯，故议论亦祇如官府呵道声耳。”此似未能窥其实质。((《谈艺录》四一)

② 《池北偶谈》。按王世贞《艺苑卮言》有“国朝习杜者凡数家，华容孙宜得杜肉，东郡谢榛得杜貌，华州王维桢得杜一枝，闽州郑善夫得杜骨”之评，渔洋盖袭而变化用之。

③ 如明人对七子宗杜与学杜不成还是分别当成两个问题来予以认识的。杨升庵云：“唐子元荐与余书论本朝之诗，李何一出，变而学杜，壮乎伟矣。然正变云扰，而剽袭雷同；比兴渐微，而《风》《骚》稍远。”(转引自《明诗纪事》丁签卷一)但钱牧斋以后即不复分辨，以吴乔“明诗无意”、明诗为“瞎盛唐诗”等说最为激烈，见其《围炉诗话》。

④ 《再为岷樵题秦宜亭所画太华冲雪第二图》。载《白华绛跗阁诗》癸集。

⑤ 同治十一年四月十八日日记。

何,而甘于自比李何。此处亟可见出他认定明七子为老杜正宗之立场的异乎寻常的认真程度。

李慈铭对于自己的诗歌要达到“真杜”的期许及自信,是与他真切体认到老杜在宋以后诗创作中所具有的最高典范的意义相联系的。而他于杜也确实是有真体会的。他早年即对杜下过大力,以至于被言社诸子公认为“善学杜”,^①甚至对其《壬戌元日作》一诗有“乃真杜,不必云学杜、拟杜”的至高之评语。^②他对杜工部集做过系统的批注,故对杜诗全体的把握颇为自负:“予于杜诗,虽瓣香所在,顾仅得其大意,不求甚解,故鲜全首能背诵者。举其命脉气息,即觉了了目前,奥窔深微,暗合无间。少陵复起,亦不以为妄语耳。”^③他即从此种把握大局的角度,对前人批评《八哀诗》诸病,表示不以为然:

宋人叶石林极诋此八诗,谓《李邕》、《苏源明》两首,累句尤多,国朝王渔洋、姚姜坞皆摘其疵。所言诚然。然读诗当观其大体,读杜诗尤当取其真诣,略其小疵。此八诗是杜公忧伤国事,兼述平生素怀,交友大略,非但思逝感旧,观诗序数语可见。其篇中虽多率句,亦间伤冗漫,而忠愤之气,溢于言外。神采奇发,自是高作,不得执一字一句绳之。正如长江大河,沙石杂下,虽不如寒潭清涧莹澈可爱,而得不推为伟观?后人以颜光禄、张燕公《五君咏》为比,以彼简贵而此芜粗,非其伦矣。若杨升庵力驳诗史之说,谓诗言性情,非道政事,以诗当史为宋人腐语,则吾不得而知之矣。夫孟子不曰“诗亡然后春秋作”乎?后之学诗者,才力俭薄,则当效颜、张,毋效杜公所谓抗鼎绝膑也。石林谓尝痛删“李”、“苏”二章,仅取其半,不知所删若何,恐必失其旨趣。(《越缦堂读书简端记》之《杜工部集笺注》卷七)

按翁方纲亦曾纠弹过渔洋对《八哀诗》的批评,但他也是从具体句法、字法的角度来反驳渔洋的意见,以为渔洋“以妙悟超逸为至,与杜之阴阳雷师、利钝并用者,本不同语”。^④李越缦则重在体察“杜公忧伤国事,兼述平生素怀,交友大略”的所谓“真诣”,而“略其小疵”,与覃溪的偏重于技法异趣。

而越缦堂所识的杜之“大略”,又与当时的一般之论不同:

人徒见杜诗之浑厚雄直,刻挚沉着,而不知其精深华妙,空灵高远,多上追《三百》,下包六代。如《丽人行》乃深得乐府艳歌之遗,《新安吏》、《石壕吏》、《新婚别》、《垂老别》诸诗,何减《十九首》?其律诗如“花妥莺捎蝶,溪喧獭趁

① 咸丰十年闰三月二十三日日记。

② 同治元年元月十九日日记。此或为李氏自评。然不论自评他评,俱可见其学杜必至的决心和信心。

③ 咸丰九年十一月十八日日记。

④ 详《渔洋评杜摘记》(《石洲诗话》卷六)。载《清诗话续编》。

鱼”、“飞星过水白，落月动沙虚”、“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远鸥浮水静，轻燕受风斜”等语，何尝不细腻独步耶？（咸丰九年十一月十八日日记）

杜律，世皆以雄阔博大赏之。于是填砌乾坤天地，万里千秋，死生歌哭，家国干戈等十余字，以为学杜嫡派。尘庸芜恶，令人呕秽。岂知此老本领，自在沉着细密处。元微之称其“风调清深，属对律切”，真知言也。仆所取多不谬于此旨，其中沉着细密者，往往十而七八，皆标举之以示后人。非从此问津，则皆航绝断港矣。（《越缦堂读书简端记续编》之《杜工部集笺注》卷十四跋语）

老杜本领自在“沉着细密”处，这个看法初与清以来直至乾隆以后方才稍息的批评明七子学杜“肤阔”的方向并无二致，但已由消极的立场转为正面建设的立场了，具有一定的指标意义。此说又更回归到元稹的最早之论，而其注意点也与当时学者不同。在越缦之前，同样宗明诗的姚惜抱即已有云：“杜公长律有千门万户、开阖阴阳之意。元微之论李杜优劣，专主此体。见虽少偏，然不为无识。自来学杜公者，他体犹能近似，长律则愈邈矣。遗山云：‘杜陵自有连城璧，争奈微之识珉玕。’有长律如此而目为珉玕，此成何论耶？”^①亦主元稹之说，但偏重于杜的长篇体例一义。这也是历来认识元氏此说的一般之见。当时持此义而影响更大的是翁方纲，他曾详为分析了杜、白、苏、陆等人的长篇体制。^②他的重宋诗的趣味也较惜抱的宗明诗更与长篇体制之旨趣相合。而同为尊微之之说，越缦所取则与他们不同。另一方面，与越缦同时稍早的潘德舆则批评元稹而主遗山之说：“微之、少游尊杜至极，无以复加。而其所以尊之者，则徒以其包众家之体势姿态而已。于其本性情、厚伦纪、达六义、绍《三百》者，未尝一发明也。则又何足以表洙泗无邪之旨，而允为列代诗人之称首哉！元遗山云：‘杜陵自有连城璧，争奈微之识珉玕。’所见远矣。”^③可见潘氏论杜诗，亦如越缦之能识大旨，但却又止于此，未能如越缦继而细究其“风调清深，属对律切”的境地。故老杜之“连城璧”，实不特遗山识之，微之本亦识之。而必要至晚清，至越缦其人，在经历了多个认识阶段后，老杜忠爱社稷的大旨方才能够与“风调清深，属对律切”的特点联系起来。显然这是更为全面和统一的认识。而遗山、养一斋或以别阐杜诗大旨的需要，反未之见也。此处亦可见出越缦对于杜诗实质的体认程度，有为晚近各家所未及者。

李越缦强调杜诗“风调清深”的特点，也间接地响应了清初以来对于七子模杜肤阔的批评。他似未就此发表过直接的意见。但如上所述，他极为肯定七子学杜的成绩，而杜诗的特点在“风调清深”，则其视七子诗的风貌为何，亦可思过半矣。

① 姚鼐《今体诗钞》卷六。

② 见其《石洲诗话》等相关著作。

③ 转引自郭绍虞《元好问论诗三十首小笺》。今《清诗话续编》本《养一斋诗话》失载。

又观其自许为“真杜”，而张香涛初评之为“明秀”，即不能为其所接受^①，必易为“雄秀”方才罢休，可见“风调清深”云云，亦即“雄”、“秀”的统一耳。

越缦堂的诗风，以今日观之，实更近于“明秀”。但他之推尊“雄秀”，如不用之于评其诗，而是改置于他的诗学，则见解自然更高。这是一个于他可以分别观之的问题。其人质“秀”，而其识“雄”。所以他能于老杜诗独许元微之“风调清深”的结论，从“雄”中得出“秀”来。若以越缦此说比观渔洋的说法：“何大复《听琴》、《猎图》、《送徐少参》、《津市打渔》诸篇，深得少陵之髓，特以秀色掩之耳。”^②则渔洋此处是从“秀”中觅得其“雄”，虽亦为推许七子，然与越缦方向有殊，“雄”、“秀”不接，以至境象匪类，显然并未得杜诗“细密”的趣味。故渔洋之识杜略未能到越缦处，其识力仍或不免稍逊一筹矣。^③

越缦论老杜和七子的“雄秀”观，其题中又另有一义，即与钱牧斋在《列朝诗集》中贬七子而别树高叔嗣等所谓“清新婉约”一派的做法，亦可有某种关联。盖明诗发展至后七子，王世贞晚年于七子诗风即已有自检讨，标举徐桢卿、高叔嗣以与李、何别。至王世懋更有“更百千年，李、何尚有兴废，徐、高必无绝响”之说。^④牧斋即承此说，而后来渔洋亦亟表赞同。^⑤此说虽有模糊七子主流地位的弊端，然别择明诗各派之不同风格，以清新救肤阔，亦自是一义。李越缦则不取此说，而始终以七子为重，此诚能识其大者。但他论杜强调“风调清深”、“雄秀”亦不废“秀”等，逗漏出上述明诗观似也是在他的视野之内的。

三、诗人之学

李慈铭诗学关于“才”与“学”关系的认识，亦须从其明诗观出发来加以讨论。这个问题自宋人发抉以来，已日渐成为明清诗学尤其是清人诗学中备受关注的的一个焦点了。越缦先生学力、诗才兼长，平日读诗、作诗间，亦每喜从此一角度发表议论，故他的意见十分成熟，实较翁方纲等强调“学人之诗”更为平允得当，而似能得

① 同治十一年四月初六日记：“前日香涛言，近日称诗家，楚南王壬秋之幽奥与予之明秀，一时殆无伦比。然明秀二字足尽予诗乎？盖予近与诸君倡和之作，皆仅取达意，不求高深。而香涛又未尝见予集，故有是言也。”

② 《香祖笔记》。

③ 按钱锺书《谈艺录》六云：“沧浪独以神韵许李、杜，渔洋号为师法沧浪，乃仅知有王、韦，撰《唐贤三昧集》不取李杜，盖尽失沧浪之意矣。故《居易录》自记闻王原祁论南宗画，不解闲远中何以有沉着痛快，非特李、杜、昌黎有之，陶、谢、王、孟莫不有。然而知淡远中有沉着痛快，尚不知沉着痛快中之有远神淡味，其识力仍去沧浪一尘也。”即此意，正可移此，转与越缦一比。

④ 《艺圃撷馀》。

⑤ 参《蚕尾续文》。

此题之正。然今日讨论此题者，多止于复初斋，结论遂不免偏颇矣。

李越缦重明诗已如上述，但与此恰成对照的是，他极轻视明人的经学。如云：

得莲士书，以明何氏楷《诗经世本古义》借阅。楷字符子，福建清漳人，崇禎中为御史，负直声，后仕南都，至户部侍郎。入闽，升尚书。闽亡后卒。此书以时代先后为主，慎倒次第，始于《公刘》、《行苇》诸篇，谓在夏少康之世，此明人割裂古书之妄习，虽多存古义，采取颇富，而支离鹵莽，得不胜数。莲士来书，谓其颇涉武断，诚然也。前有范文忠、林兰友（字操圣）、曹学佺（字尊生）三序。予最不喜明人经说，因遂还之，并以《三朝要典》属转还节子。即作复书，言《毛诗》之学，以注疏及吕氏《诗纪》、严氏《诗辑》为之纲，以国朝陈氏《稽古编》、胡氏《后笈》、李氏《紬义》、马氏（瑞辰）《传笺通释》为之纬，他书可不读矣。（同治五年正月廿一日日记）^①

所言固亟申明“学”之弊。同时又可见出他对于本朝（及宋人）经学的推重。故于本朝学、诗的评价，他恰好反过来：重学而轻诗。^② 诚然，一代之学与一代之诗之间，并不必然呈现为相同之象或相反之质；李慈铭对于明清之学与诗所持的这样一种交叉褒贬的态度，自是无意为之，本身亦并不能说明明清学术与诗文之间的什么问题。但这里将之罗列在一起，却可以十分直观地呈现出李氏分疏学、诗的思路，即“诗”的优劣并非简单地维系于“学”的大小。

这一分疏的思路作为“真”命题，在李氏诗学中的极有意义之处，即是他能够推尊所谓“或歎读书”的王渔洋为一代诗学正宗：

国朝诗家，渔洋最得正法眼藏。商榷真伪，辨别淄澁，往往彻蜜味之中边，析芥子之毫发。至乎论古，或歎读书，而语必平情，解多特识。虽取严生之悟，迴殊欧九之疏。大雅不群，庶几无愧。（同治三年十月十七日日记）

阅王阮亭《周易录》。阮亭于诗，虽专取兴趣，颇窘边幅，然论诗实有微悟。

^① 又如比较宋、明之学云：“南宋经学，自卫正叔《礼记集说》、吕东莱《读诗记》、严华谷《诗辑》、李如圭《仪礼集释》外，说部自王伯厚《困学记闻》、洪文敏《容斋随笔》、王勉夫《野客丛书》外，尚皆有一二可取。明则直无可称。必不得已，其郝京山之经学、杨升庵之杂学乎？文集则明胜于宋，元胜于明。”（同治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记）皆是此意。

^② 他对本朝诗的评价是：“至于国朝，实黜作者。渔洋七绝，实掩唐人。此体之余，仅为宋役。愚山五律，迦陵歌行，皆足名家，亦专一技。三君而外，则推竹垞、初白、太鸿耳。然竹垞瑜不胜瑕，初白雅不胜俗，太鸿颇多隽语，苦乏名篇。余子纷纷，概无足数。文章有待，风会相因。方驾古人，或在来哲。昭代文至刘海峯、朱梅崖，诗至沈归愚、袁子才，可谓恶劣下魔矣。而近日文更有桐城末派如陈用光、梅曾亮者，则以归、唐之藟苴，为其一唱三叹也；诗更有西江下流如张际亮、朱琦者，则以王、李之臭腐，为其三牲五鼎也。而大臣之好文，名士之能诗者，震矜以张门庭，依附以窃声价。于是文人则有某某，以为由桐城溯史、班，而一字不通矣；诗人则有某某，以为由西江溯杜、韩，而一语不成矣。”（同治三年十月十九日日记）

此录所评鹭去取,皆折衷平允,无一苟语,学者当奉为法也。唐宋以来论诗者,莫精于是矣。唐人论诗如《刘宾客嘉话》等,已多不可解。宋人诗话最多,大率迂浅偏滞,无有真际。如《诗话总龟》、《渔隐丛话》,所采掇甚备,罕可取裁。明人更谲诡矣。盖中无真识,而喜为大言,或以私意标榜,风斯益下耳。(光绪十七年五月二十七日日记)

这里越缦与历来讥渔洋“学浅”、“才小”者最不同的是,他也不是不知渔洋“歉读书”、“窘边幅”,却仍不妨碍他认识到渔洋诗学的“精粹”。^①此言出自“不歉读书”的越缦之口,客观上自然也更具有说服力。然则越缦之论,首先极为明确地区分出了诗(文学)与学术为两个不同的范畴,而互有其独立性。这是李慈铭的学术思想与现代学术最可以相通的地方。所以他能毫不含糊地独尊渔洋诗学为专门之学,较之袁枚以及翁方纲等的保留之论,这亦不愧为他的特识。

中国传统学术虽自向、歆以来即已有分类之举,但本质上始终以“通”为职志。《诗》乃一经,文、史互训,所以宋以来出现的所谓诗关学还是“非关学”的话题,实与中国学术尚“通”的基本性质有关。但与此同时,这也是新一轮学术分门别类意识开始抬头的反映,以至于聚讼不已。越缦标举渔洋,一方面不以其“歉读书”为嫌,一方面也不忘指出其学“迥异欧九之疏”,可谓是最能把握此题之分寸者。

不过,从宋人讥欧阳修“不读书之过”,^②到清人对王渔洋“或歉读书”的抱憾,也确实可以感受到宋以后对于诗人学养的越来越高的要求。且看本编评论门中荟萃的越缦对于本朝人的诗评,“读书”与否也每每成为他分析诗功高下、诗作优劣的主要参照标准之一。如论乾嘉诗坛的几位大人物,言沈德潜和王昶师徒,述庵“实胜归愚,盖源流虽同,而读书与不读书异也”;^③言蒋心余、钱蔥石“皆一小家诗人耳,蒋尤不知学”。^④论明人程嘉燧也说:“松园材力既局小,读书又不多,钱蒙叟推为一代宗主,自难服人。然其平生耽精诗画,得于山川者深,所作风致绝世,自足名家。”^⑤平常阅人之诗,也习惯从读书多少品赏之:

雪瓯来,以近作五律五首见视,皆稳秀老成。……昔年律诗无此境界,盖

① 如袁简斋、钱默存等,亦颇能识渔洋的具体之论,然每嫌其“才力薄”,故不如越缦所见充分。见《随园诗话》、《谈艺录》等。至于翁覃溪,则阳奉而阴斥之,见其《石洲诗话》及《神韵论》等文。其他则更无论矣。

② 《西清诗话》卷下:“欧公嘉佑中见王荆公诗:‘黄昏风雨暝园林,残菊飘零满地金。’笑曰:‘百花尽落,独菊枝上枯耳。’因戏曰:‘秋英不比春花落,为报诗人子细看。’荆公闻之曰:‘是岂不知《楚词》“夕餐秋菊之落英”?欧阳九不学之故也。’”又钱锺书《谈艺录》谓语出刘原父。

③ 同治二年正月二十八日日记。

④ 同治二年正月二十四日日记。

⑤ 咸丰十一年九月初六日日记。

近日颇肯读书所致也。(咸丰十年十月十二日记)

夜为马上舍廉良点阅《拙怡堂诗》。上舍字幼眉，其诗读书尚少，未能成家。然才致清新，近体具有作意。(同治五年四月初三日日记)

钱塘汪子用来，以新刻湖人费丹旭《依旧草堂遗稿》见赠。丹旭字晓楼，以画名道光间，尤工于仕女，稿仅一卷，诗百余首，词十阙。丹旭未尝读书，而所作颇有婉逸可取者。(同治七年四月二十三日日记)

绂丈来，还平种瑶《耕烟草堂诗钞》二卷，因摘其佳句于此。……自所取之外，大率拙劣，亦有极恶者。盖读书太少，不免弃陋也。(光绪七年六月十六日记)

这里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读书”标准使用的频繁，以及使用的自如。盖在越缦手上，读书是一个习以为常的观察角度，但读书多少与诗的好坏却又并非必然成正比，事遂至于平实。此即由其二分的思路使然也。即作为诗人的学问和作为学者的学问，标准与要求实际上并不相同，自应分别对待之。如此则学问之于诗人，就主要成为一个修养的问题了，即诗人的“学养”问题。上述李越缦频频提及的对于诗人“读书”的要求，其把握到的度，正在此处。诗人绝不能不读书，但也不必然要读到如学者那样的专门程度。此即所谓“诗人之学”也。后世如钱锺书《谈艺录》，也十分明确地从“诗人之学”的角度来谈论这个问题，遂将越缦的这一难得的思路和成果保持了下来。^①

但这个问题的一般思路与提法是以“诗人之诗”与“学人之诗”并列出之的，如雍、乾间方贞观《辍锻录》云：“有诗人之诗，有学人之诗，有才人之诗。”^②这自然也是一种“分疏”的思路，但不同于上述将问题归之于“学”(诗人之学)，而是归之于了“诗”，这样分疏出的，就是“诗人”、“学人”等种种有别的诗了。而且“学人之诗”的提法，其初衷原就是为了驾于“诗人之诗”上的。^③故此种提法虽然反映了宋诗尤其是清诗重学的某些史实，却往往容易偏离于“诗”作为一门艺术的基本性质。所以至晚清民初，陈衍又有“合学人诗人之诗二而一之”的说法，意在矫枉，最为今人称许为全面。但“合二而一”终不脱分一物(诗)为二物(学、诗)之嫌，不如李越缦、钱默存“诗人之学”之整一的说法为优。如晚近钱仲联先生注《海日楼诗》，欲树沈曾植为晚清民初诗坛之高帜，即持石遗“合学人诗人之诗二而一之”一说为凭，而大不满陈散原评寐叟诗的“硕师魁儒之绪余，一弄狡狴耳，疑不必以派别正变之

① 钱锺书《谈艺录》五三论韩昌黎、钱锺石诗，拈出“诗人之学”一种，所谓“为学人则不足，而以为学人之诗，则绰有余裕”，以与学者之学别，即此意，然越缦已先言之矣。

② 载《清诗话续编》。

③ 如盛如梓《庶斋老学从谈》引南宋张栻语：“诗人之诗不耐咀嚼”，“学者诗读着似质，却有无限滋味，涵泳愈永，愈觉深长。”